

# 抗美援朝：改写历史的伟大战略决策

■ 廖伟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响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之战。60多年后重温这段历史，深感志愿军入朝是深远睿智、果敢及时的战略抉择，维护的是核心安全利益，赢得的是国际斗争主动，构建的是战场先发优势，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战略运筹。

**权衡利害，谋求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史学界把朝鲜战争视为苏联的代理人战争，指责中国出兵朝鲜是迎合苏联的军事冒险。这种冷战思维下的“站队”论调，全然不顾当年美军执意越过“三八线”的历史事实，全然无视美军海上侵入台湾海峡、陆上逼近鸭绿江对中国地缘安全的极大威胁。志愿军入朝作战，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逼出来的。周恩来指出，“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

从军事攻防角度看，如果坐视美军压至鸭绿江边，中国将被迫在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上部署大量守备兵力，还要陷入改善装备、修建机场、加强战备的被动局面，美军飞机对东北边境地区的轰炸可能将天天上演。这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所要极力避免的。彭德怀在自述中形象地比喻，“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如果美帝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抵御敌对势力的侵略颠覆，维护中华民族核心的生存利益，党中央毅然决然作出抗美援朝的伟大战略决策。用毛泽东的话说，“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国一跃成为下好“先手棋”的“棋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是大大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美国苏联都不敢再像战前那样轻视中国。这些后续的国际形势发展，也恰恰印证了毛泽东先前的战略判断。

**决胜陆上、扬长避短。**近年来，国内



志愿军入朝作战，维护了新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

史学界少数人时常怪罪重弹，抱怨“抗美援朝耽误了解放台湾”，然而，出兵朝鲜既要靠极大的战略勇气，也要靠睿智的战略抉择。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中国面临的是两线作战：海上，美军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公然干涉我内政，阻碍我军解放台湾；陆上，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再三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强敌当前，到底是解放台湾，还是出兵朝鲜？这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选不好就可能严重战略失败。党中央审时度势，最终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定。这一决定，是基于当时我国的地缘安全态势和军事实力所作出的，体现了毛泽东一直以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军事思想。从军事博弈角度看，美军海空军占据绝对优势，以我军当时极为有限的海空军兵力解放台湾，并不占优势，反而容易陷入战略僵持或被动局面；但如果把战场放在陆地上，则有利于发挥我国地缘优势、我军数量优势。

当年，党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正是基于对敌我双方优劣条件的全面分析，认为美国在军事上是“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分别是战线太长，从欧洲的柏林到亚洲的朝鲜，首尾难

以相顾；运输线太长，要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战斗力不如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相比之下，我军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并经20多年革命战争锻炼，官兵团结，凝聚力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团以上指挥官都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八路军，我军向来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经验；在朝鲜作战，中国军队拥有直接和雄厚的后方支援，利于持久作战；中国有苏联为后盾，可获得苏联的物资支援，等等。因此，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充分发挥我之长处，则可以和美国达成相对的战略均势。我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杰出表现，有力证实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自信，我军指战员充分发挥战术灵活性弥补武器装备和保障差距，志愿军以“气盛”战胜“钢多”，创造了松骨峰战斗、葛岷岭战斗等经典战例，先后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战斗英雄，在精神和意志上完全压倒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李奇微不得不叹服，“中国人被打倒一批，又冲上一批，超过尸体往上攀登，继续冲锋”。美陆战1师作战处长鲍泽上校在回忆录中写道：“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狼命打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料敌先机，出其不意。**美国人看待中国出兵朝鲜，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刚刚建立、国内工农业总产值只及美国1/28，军事装备基本上还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的国家，竟然敢于跟拥有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的美军相对抗。这种“唯实力论”造成当年美国决策层、军事界的思维误区。战前，美国情报界普遍认为我军不适合在朝鲜作战，不会入朝作战。

相比之下，中国人关于抗美援朝的形势判断，在时间把握和分析深度上是领先于对手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周恩来就充分考虑到在美国武装干涉下朝鲜战局形势发展长期化或形势逆转的可能性，认为中国对此不能没有防范准备。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周，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一周，中国就开始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抽调国防机动部队共25.5万余人，集中到辽宁东部和吉林东南部地区进行整训。从8月中旬开始，东北边防军以美军为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进行作战准备，为中央出兵朝鲜做好先期准备。而且，为保持战略突然性，在跨过鸭绿江的行动过程中，我军坚决贯彻中央隐蔽行军的命令，所有向中朝边境和朝鲜开进的部队，昼伏夜行秘密开进朝鲜，数十万大军完全未被美军发现。直到11月1日，志愿军部队对距中朝边境80公里的云山发起进攻时，美军才发现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而等待美军的是志愿军在战场上对他们的当头一棒。

（作者系北京卫戍区海淀第11退休干部所政委）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场景

## 毛泽东何时提出中国要有原子弹

■ 崔茂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毛泽东最早是何时提出中国要发展核武器的呢？

1944年，中国共产党获悉美国正在制造一种“超级炸弹”的消息，从1946年开始我党便与海外的中国科学家特别是核科学家和火箭专家进行联系，争取他们回国参与核武器及配套武器装备的研究，并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核物理研究需要的器材和资料。上述工作无疑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文献记载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中国要研制核武器的想法是在他访问苏联的1949年底。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苏联。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当时，苏联内务部门和公安部门领导人贝利亚也在场，在他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的谈话，其日记还提到，斯大林曾对贝利亚说，中国想分享苏联的核技术，并想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寻找铀矿，制造原子弹。贝利亚表示不愿意这样做，斯大林似乎也没有反对贝利亚的意见。

在毛泽东这次访苏期间，苏联方面还特意为他播放了当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新闻电影纪录片。也许是受到纪录片中核武器爆炸威力的震撼，毛泽东在归国途中再一次表达中国要研制核武器的想法。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

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挥舞的核大棒让毛泽东认识到要消除核威胁就必须首先拥有核武器。他后来曾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1952年6月，中国向苏联请求给予研制核武器方面的援助，但遭到拒绝。这使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编制《五年军事计划纲要》时，被迫放弃研制原子武器的想法。1954年10月，毛泽东向来访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再次表达了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想法：“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婉拒毛泽东的请求，但还是答应先帮助中国建设一座小型原子堆并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中方也可派人到苏联学习。

1955年1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的构想。

（作者单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



### “方择日救患乎？”

唐朝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原董秦，安史之乱时，他从史思明处逃出，身边已无多少兵马，朝廷见其忠心不二，故赐名李忠臣以示表彰，任命其为陕西、神策两军节度使兵使，后又出镇淮西。

永泰元年（公元764年），吐蕃进犯关中，京师戒严，唐代宗急征各藩镇发兵勤王。朝廷使者来到淮西时，李忠臣正在打马球，接到诏书后李忠臣立即放下球杆，调集兵马救驾。部下大将说：“军队出征应当选择吉日。”李忠臣大怒道：“君父在难，方择日救患乎？”当天即出兵勤王。李忠臣成为第一个赶到长安救驾的节度使。

### 误认潜艇为渔船

二战期间，美军潜艇在日本近海的行动中进行了有效伪装。如1942年8月23日黄昏，日本岩手县山田湾外海域约30海里处，日本渔船“福荣丸”号发现一艘帆船，其实是美军潜艇伪装后的样子，“福荣丸”号之后被美军潜艇炮击沉。当年8月31日黄昏，日本渔船“日朗丸”号又将伪装后的美军潜艇误认为是渔船，结果在夜间受到这艘美军潜艇的鱼雷攻击。

### “神枢”改“得胜”，射程不增反减

清朝旧式火炮基本都是明末清初从外国引进的衍生型，直至鸦片战争前都没有大的改进，甚至还出现倒退。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清廷将160门明朝遗留下来的“神枢炮”改为“得胜炮”，改造后的“得胜炮”射程不到百步，居然比“神枢炮”的射程还近。

清廷还限制火炮武器的使用与发展。如明朝的“佛郎机”炮，采用母铤和子铤的结构，具有射速快的特点。清廷称其为“子母炮”，就是这样一种明朝早就装备的火炮，清廷还限制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八旗军内使用，不允许汉人组成的绿营使用。

（乌 沃）



第一次车臣战争俄军失利，与其指挥体制权责不清有很大关系



## 大国军队总参谋部源起之二：苏俄军队总参谋部

■ 阳 晶

### 最早起源于沙俄

1763年1月14日，沙俄军队就在俄军军务(勤务)部门的基础上组建“陆军下属总参谋部”。早期的沙俄总参谋部有名无实，根本无法履行平时战备和战时指挥职能。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后，沙俄总参谋部总局才成为陆军部战略计划制订和陆军力量战争准备的重要机关，但其整体指挥运行效能仍落后于德国总参谋部，这也成为沙俄军队在一战东线一败再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月革命后，俄国于1918年5月成立全俄总司令部，负责管理苏维埃部队的组建、配置和训练，研究共和国国防问题。1921年2月，全俄总司令部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合并为工农红军司令部。1935年9月22日，该司令部正式更名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下设作战部、情报部、组织部、动员部、军事地形测量部、军事交通部、后方组织部等部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部队和各级司令部高度的战备水平，主要负责制订在战争

和战役中使用苏联武装力量的战略设计计划，完善部队的组织编制，从事动员和物质技术保障工作，拟订向工业部门订购武器和技术装备的计划，领导高级指挥人员和作战司令部的作战训练以及研究苏联军事理论问题。

### 二战中形成独特模式

在国内战争、卫国战争和苏军建设发展中，总参谋部起到重要作用，很多著名红军将领都担任过总参谋长一职。如1924年担任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伏龙芝，他是苏联最受推崇的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之一，其率领南方面军击败弗兰格尔军队、解放克里木半岛的作战行动，被列宁称赞为“红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伏龙芝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主持红军军事改革，创建常备军与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整体国防力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把红军人数从550万裁减到56.2万，对红军的正规化建设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他所提出的军事学说在后来的苏联卫国战争中都得到证实，其军事著作被视为苏

俄军队的理论经典。卫国战争爆发后，总参谋部隶属于最高统帅，成为斯大林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主要指挥机关，负责制订战略计划和指挥前线军队。战争期间，斯大林要求总参谋部特别注意与各方面军司令、各舰队司令及其司令部保持经常的联系，检查军队执行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和指示情况。斯大林不仅明确总参谋部的作息安排和汇报制度，还亲自规定总参谋部领导干部的作息时间。对于未按规定汇报的现象，斯大林一旦发现必定严厉批评，即使是总参谋长也不例外。总参谋部代表常常往返于大本营和各方面军之间，为部队提供帮助，参谋、协调、辅助的作用更加明显。

曾任苏军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回忆，“只要大本营一确定在哪里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我、朱可夫和其他军事首长就要被派到前线去了解情况，然后回到大本营参加定下战役最后的工作。大本营批准计划后，要向各方面军下达指令，并飞往前线帮助各方面军贯彻执行大本营指令。”这种走马灯式的穿梭指挥方式，成为苏军卫国

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作战的一大特色。虽然看似程序繁琐，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苏军统帅部更广泛地集中各营的主要指挥机关，负责制订战略计划和指挥前线军队。战争期间，斯大林要求总参谋部特别注意与各方面军司令、各舰队司令及其司令部保持经常的联系，检查军队执行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和指示情况。斯大林不仅明确总参谋部的作息安排和汇报制度，还亲自规定总参谋部领导干部的作息时间。对于未按规定汇报的现象，斯大林一旦发现必定严厉批评，即使是总参谋长也不例外。总参谋部代表常常往返于大本营和各方面军之间，为部队提供帮助，参谋、协调、辅助的作用更加明显。

### 战后历经多次改革

卫国战争结束后，红军总参谋部转隶国防部。自1946年6月起，总参谋部改称为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1950年至1953年，设有海军总参谋部。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于1950年更名为苏军总参谋部，1955年起又称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二战后，总参谋部在确保苏维埃国家可靠防御方面被赋予更重要的作用，总参谋部要分析军事政治形势，确定武装斗争手段和军事行动方法的发展趋势，组织武装力量的训练，提高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以击退任何可能的侵略，还要协调各军种、后方、苏联民防、国防部各总部及中央

部的活动，并保障最高统帅部和国防部对武装力量实施领导。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于1992年组建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叶利钦任内大力推动总参谋部职能单纯化，把行政职能基本转移给国防部，而总参谋长仍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军指挥体制处于权责不清的混乱状态。如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北高加索司令部由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一副局长克瓦什宁领导，而指挥机关则由俄联邦国防部的将军们和军官组成。

在普京推动的“新面貌”改革中，俄军通过“总参谋部放权、军种让权、军区扩权”的方式，将总参谋部的部分行政管理、装备发展建设等职能转交国防部，强化战略规划、作战指挥、战役训练等功能，明晰了总参谋部的指挥权责，将战略级作战指挥权集中于总参谋部，并将战区作战指挥权下放到军区，使总参谋部能够更加专注于战略级联合作战指挥。同时，军种司令部退出战略级联合作战指挥链，并采取分阶段方式逐步上交海、空军战略指挥权。2012年，俄海、空军中央指挥所正式并入总参谋部中央指挥所，指挥所作为战略级联合作战指挥链单位由组成式变为融合式，开始全面对海、空军部队实施指挥，对全球态势变化进行分析评估，对全军战备执勤实施综合监控。目前，俄军在战略级联合作战指挥链上形成了以总参谋部为主体的四级指挥模式，即总统—国防部长—总参谋部—军区及直属战略力量。

（作者单位为军委政治工作部群工局）

